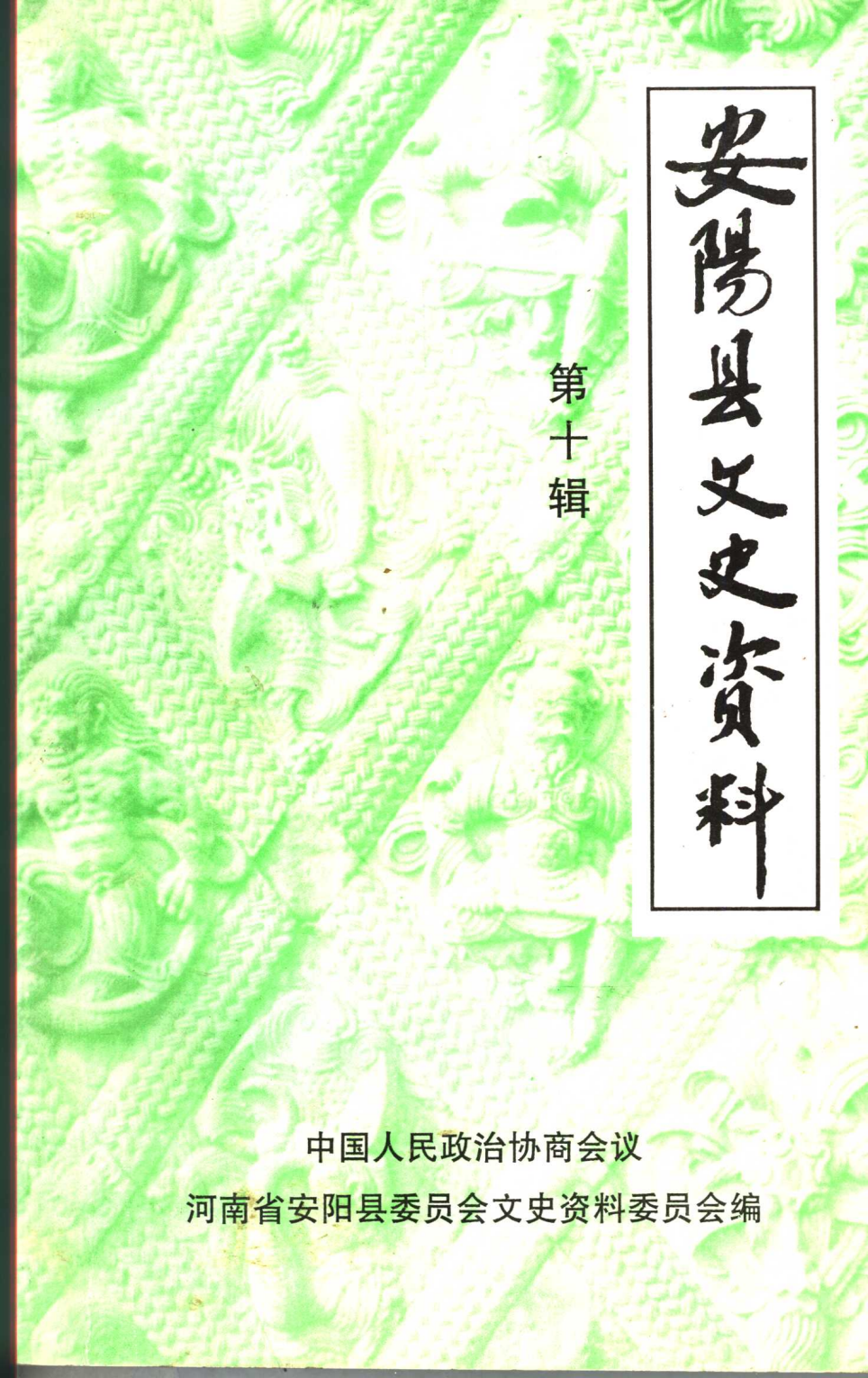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陽县文史資料

第十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〇年八月

顾 问：张奎堂

主 编：贡献德

副 主 编：贾宝兴

张 玲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的革命生涯·····	孙有谋(1)
抗日战争中回忆片断·····	孙有丰(43)
地下工作者王兴·····	张星桥口述 张桂英整理(57)
略谈名人张了且·····	张振海(60)
张天骥议政重教二三事·····	许义生 张振海(67)
张步峰在朝鲜·····	盛星辉(70)
记一级战斗英雄负宝山·····	许义生供稿(75)
回忆革命先贤冀三多·····	张辰水(77)
安阳县三区民兵斗争的故事·····	王家庆(85)
记杨奇村地下交通站·····	公 羽(95)
邺县指挥部营救孙德信出狱始末·····	张从凤(99)
日军飞机为何多次轰炸岭头村·····	王怀筠(108)
盟军飞机空投与轰炸豫北日军·····	王革勋(110)
木厂屯惨案纪实·····	舒占忠 关绿飞(112)
安阳战役散记·····	孟广文(114)
我军四次解放安阳简介·····	王革勋(126)
县医院初期建院的回忆·····	桑振书(131)
王自全“避难”记·····	朱振前口述 金星、陶陶整理(134)
猫哭老鼠的追悼会·····	张笑平(136)
王廷弼三进监狱·····	王怀筠(138)
汉奸李英二三事·····	许义生(142)
河南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九任专员简介·····	孟广文(145)
八年抗战期间日本驻安阳地区部队·····	淇 洹(150)

解放战争时期驻豫北安阳之国民党军队·····	淇 洹(152)
解放初期安阳城及其附近的驻军·····	淇 洹(155)
国民党四十军主要将官的最后归宿·····	许义生(159)
“一贯道”回忆·····	张光济(163)
槐树岗截花轿·····	高步照口述 王德劭整理(166)
安阳七朝古都简介·····	张辰水(170)
安阳县建国前后建置沿革和疆界变迁·····	孟广文(178)
雪花洞的来历和文物古迹·····	王怀筠(185)
王金声先生的思想探讨·····	张振海(188)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孙景凤(201)
殷都怀古赋·····	王有弼(206)
甲骨文与安阳的古都地位·····	李建武(208)
甲骨文简明知识问答·····	王西坡(213)
安阳县发现百年乡土古籍·····	王革勋(216)

我的革命生涯

孙有谋

我于1923年11月20日(民国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第五区南流寺村(今属安阳市郊区西郊乡)。父亲孙尚志(原名孙秀成,人称孙老尚)当时在开封省立义务学校教书。我乳名润生,后取学名孙有谋。我村位于县城西部平原的腹地,土壤肥沃,河渠纵横,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远近闻名的好地方。尽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在当时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老百姓并没有好日子过。我家的生活更是长期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早年由于曾祖父和祖父在贫病折磨下相继去世,剩下两代寡母抚养我父亲、叔父三个年幼的孩子,受尽了煎熬和欺凌。为改变这种命运,祖母不惜卖地、借债供父亲读书。父亲从汲县省立五师毕业进入教育界工作之后,家庭生活略有好转,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但不久村里就发生了孙、李两大家族争种社地(古代遗留下来的公有财产)的矛盾,从争吵打架以至械斗流血,继而是摊款告状,打起了没头没尾的官司,弄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有的甚至一蹶不振、家破人亡。我家为孙姓家族成员,自然被牵扯在内,备受拖累,使刚刚好转的家庭生活又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我的幼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学生时代

1931年我开始上学,就读于本村私塾,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课本,每天还用一定时间“描红”,练习写字。塾师孙宝善为学生立下许多规矩,每天限定读几行或几段书,要反复朗读,读通读熟,还要求能背诵,而且学完一本书时还必须从头到尾全本背。背不下来,轻则罚站,重则打手板。记得有一次就因我没全背出课文被老师打了一板子。这种方法虽说不可取,可对促使我用功读书还是有好处的。

这时正处在新旧教育制度变更之际,官方正在推行新学,废止私塾,常派人下乡检查。为了应付检查,我们准备了些“洋书”,一听说有人来检查了,就捧起“洋书”,高声朗读:“弟弟来,妹妹来,来来来……”;等检查人走了,仍旧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或“人之初,性本善”。这样一来,我觉得“洋书”读起来更有兴味,不由萌发了上学堂的念头。1932年,在我父亲(这时已回本县工作)的帮助下,我村教育事业由旧学制改为新学制,成立了小学初级班,由孙生金、齐清彦先生分别教语文和算术等课程,使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开始接触新的文化科学知识。

1934年,父亲在县教育科任督学,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材,除省吃俭用供哥哥孙筱尚(字希文,长我九岁)到北平交通大学读书外,当年秋又把我送进县立第一小学校三年级学习。这所学校设立在县城鼓楼东街贡院旧址,是科举时代选拔贡士的地方,系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明代著名学者崔铤创办的后渠书院改建而成。它是安阳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小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高,又是当时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掌握的一所进步学校。校长张仲房是爱国进步知识分子,训育主任何高民是中共安阳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教师薛慰余、吴菊馨(女)、孔繁露、李振

权(女)、张冰洁(女)等系共产党员。他们团结联系广大师生,成立了“安阳儿童救国总会”、“安阳青年反帝大同盟”和“赤色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并创办了《儿童新报》(社长张仲房,总编辑何高民,共青团员马骥宸、李敬龙负责发行工作,发行到全县中小学校和新乡、焦作一些学校)。我一进校门就感受到浓厚的进步气氛。

当时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期,在每周一的周会上和每天的朝会上,常能听到校长或老师的形势报告,讲国内外大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在三天一期的《儿童新报》上能读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打击敌人的斗争事迹以及全国各界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呼声。在音乐课上和集会上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毕业歌》、《大路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所有这些都使我受到强烈感染,开始对国家民族命运焦虑不安,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媚外势力切齿痛恨。

在这一阶段,我除在上课时间学好各门课程外,还在级任老师(班主任)李振权具体领导和安排下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

一、参加宣传活动。在节假日和星期天,李老师带领同学到安阳桥、延年庄等郊区农村,放映自编自制的幻灯片,向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掠夺我宝藏的罪行,唤起群众起来抗日。到西关马市街广益纱厂工人宿舍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此外,还利用我父亲担任《民声日报》主编之便,将学生作文《一个拾煤子的小孩》和《一个洋车夫》等登在报纸上,揭示民间疾苦和社会黑暗,唤起人们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二、张贴传单。根据李老师的安排,我和同学刘翘安(西古庄人)身穿童子军制服,内藏传单,装作结伴闲游模样,瞅准前后无人之机,先后把传单贴在大西门外城墙上和县政府前面的大影壁后面。还到神路街文运书店以买书为名,暗地将传单夹入书内,以此方式使传单流入社会。

三、破坏敌人交通。按李老师交代,我们到铁路边玩耍,在无

人注意之时将石块放在钢轨之上，以破坏反动派的铁路运输。

1935年初，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元二事件”，我校校长张仲房在教工帮助下脱险，教育科督学孙鸿模在我父亲掩护下脱离虎口。不久，共青团员马骥宸被捕，牺牲在开封监狱。从此，学校革命活动转入低潮，进行隐蔽斗争。

在县立第一小学的三四年间，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7年夏季我高小毕业，考入了河南省立安阳第十一中学（校址在县城内东南营昼锦堂）。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大举进犯。10月13日，日本飞机轰炸安阳，学校被迫停课。日寇侵华打破了我求学深造的计划，使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在黄金时代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得不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离家抗战

1937年11月4日，日寇攻占安阳，我家到南岭王北河村亲戚家避难。一天夜里，我父亲和两位叔父在昏暗的油灯下对面而坐，眼里满含泪水，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在一旁心里也充满焦虑。过了好大一会，三叔才对我父亲说：“大哥，听说日本人到哪里先杀识字的人，你和润生还是往南边去躲一躲吧。”父亲沉思良久，说：“那好吧，我就带润生暂时出去避一避，你们就先住这里，等局势安稳一些再回家。”第二天一早，父亲带我顺南岭向东步行到汤阴火车站，登上南去列车，于当晚到了许昌南边的临颖县城，找一旅馆住下。在火车上听说这里有不少安阳人，但经几天探寻，一个乡亲也没有找到。只见到处在传说日寇南侵和杀人放火的消息，人人惶恐不安，却看不到当局有什么抗日措施，也看不到对群众的战争动员。在这里举目无亲，父子两人一日三餐和住宿都要花钱，没多久

所带盘费已所剩无几。父亲整日默默无语,我知道他是在考虑下一步打算。一日在旅馆里,他猛然从床边站起来,对我说:“逃难不是办法,躲到哪一天是够?别无出路,回乡抗日!”于是当天就乘车北归。这时大约是1937年12月中旬。

车到汲县不能再往北开,我们父子下车后暂住在当地耶稣教堂里。在这里,父亲遇到了从开封返回的原安阳县政府教育局长张韶华(张从虞,博爱村人),他已被南逃的河南第三督察行政专署专员程起陆委派为安阳县长,正要回去接替代理县长张守魁重组安阳县政府。和他同行的有教育界人士牛伯友、霍其凤等。第二天又遇到了父亲的学生、地下党员何幼琦和第一小学老师高其寿,他俩是率领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在辉县活动受挫后正要返回安阳的。乡亲师友此时异地相逢自然就谈论起对时局的看法和如何合作抗日的问题。由于时间紧迫,父亲很快就同他们一起步行到安阳西部山区去了。我随后由第一小学老师郑茂公陪同返回南流寺老家。

不久,哥哥筱尚也回到家乡。他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民先”。正当大学毕业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学校让他们到西安等候分配。在西安,他从报纸上看到安阳义勇军抗日的消息,毅然放弃到铁路部门工作的机会和优厚待遇,返回家乡参加敌后抗战。在村里,乡亲们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就是从这一带向东攻入安阳县城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在西梁村就杀害手无寸铁农民四十多人。我村正在办丧事的李长荣及其亲友多人也被枪杀。我们还亲眼看到了横尸在我村北地的32军142师大批阵亡将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寇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了我们的满腔义愤。

这时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已经解体,筱尚多方奔走,与西梁村爱国青年宋子美(宋彦,北师大毕业,“民先”队员)一起联络一批青年,自带枪支组成一支义勇军,到汤阴找32军商震部要求给以名

义,以解决给养问题,竟遭到训斥和毒打。他毫不气馁,继续寻求抗日救国之路。1938年2月,听说何幼琦在南坪办抗日训练班就前往求教。同年夏,得悉四支队到了林县,他立即和宋子美、董筱溪、马子才三人赶到林北坟头村拜见了纪德贵和何高民。纪德贵和何高民告诉他们,抗日是持久战,需要动员各方人力物力才能最后战胜敌人,鼓励他们利用各自的影响团结发动各阶层人士,在地方坚持抗日斗争。这次谈话使筱尚受到很大启发,回来后就去岭头找张韶华,要求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活动。经多次交涉,加上父亲(时任县政府秘书)从旁协助,张韶华终于同意在县政府民运工作队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工作团(简称政工团,保留民运队称号),由筱尚任主任。于是在1938年8月,他就带着义勇军成员到南岭开展抗日活动去了。我本想跟他一起去,他说我年龄尚小(十五岁),劝我暂时留在家中。

这时农村局势更加动乱,灾难更加沉重。日军、皇协军、汉奸会道门武装轮番到村里骚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甚至一日数惊,鸡犬不宁。一次伪军包围我村,竟向无辜村民开枪射击,孙丑只和其怀中的幼儿被罪恶的子弹击毙,倒在血泊中。目睹这一幕幕的悲惨景象,再也无法忍受。亡国奴的滋味尝够了!一个热血青年,国难当头,要尽一份责任,去与日寇斗争。就在这年10月,我决然告别母亲。到西部山区闫家庄参加了政工团。父亲和哥哥见我决心很大一致支持我,使我受到很大鼓舞。

政工团是一个武装救亡组织,约有百十人三四十支枪(其中手枪多由团员自己从家里带来,步枪由孙有富支援十支)。团内设武装组、民运组、宣传组和总务组,由郭磊、宋子美、王灵雁、郝升旭任组长。成员多为本县农村知识青年,也有少数农民和店员。现在记得名字的有侯金镛(中共党员)、郝生秀(“民先”队员)、李冷斋(李凤来)、李凤岐、尹文正、齐星海、周进之、徐照录、张常慎(张怡秋)、孙宝英(孙一萍)、杨秀珍(杨波)、范忱挺、袁世香、冀三多、路

金亭等。

政工团成立之初,就通过联络员侯金谔与八路军元康工作团(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和四支队取得联系,带来许多抗日书报和宣传资料,如《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萍踪寄语》等。筱尚让总务组长郝升旭把《论持久战》和其他重要材料刻板油印,每人一份进行学习,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元康工作团也派安阳工作组魏十篇(魏克仁)、盛振强、张亚夫、侯兆璞、郝贵峦等先后来政工团做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做青年工作,发展“民先”队员(据张亚夫回忆,先后发展“民先”队员22人)。由于得到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政工团抗日气氛浓厚,同志们个个热情高涨,团里不断回荡起激昂的抗日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大家都来想一想,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就兴旺,两党合作国家就不会亡。……”

在这种国共合作一致对敌的形势下,政工团展开了积极的抗日斗争。武装组活跃在接敌区和敌占区,捉汉奸,搞爆破,截汽车,割电线,刨线杆。查禁资敌物资,查禁毒品,还配合友军直接参加作战。政工团成立不久,就奉命抓获一名汉奸区长,押解他到各村游街示众,历数他的投敌卖国罪行,然后将其处决。政工团在石偃村住的时候,曾几次同住在南偃村的97军铁路破坏大队一起,由侯金谔同志作向导到城北洪河屯、豆公等处铁路上安设炸药,炸毁敌人机车和车箱多辆,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铁路破坏大队那位小个子营长胡忠良、副营长刘致祥,他们说话和蔼,平易近人,衣着简朴,脖围白手巾,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沉着勇敢,堪称友军中坚决抗日的优秀指挥员。不幸在第三次执行爆破任务时刘致祥副营长中弹牺牲,他的鲜血流尽在安阳大地上。武装组还两次参加马鞍山保卫战,配合县保安二中队李炳耀部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还在郭磊带领下参加南庵大战,配合孙有富部

粉碎日伪军的围攻,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

民运组在县政府辖区各个村庄宣传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支援抗日,还动员青年参军。有时他们在武装组的配合下,到前沿区和敌占区,召开上层人士和保甲长座谈会,讲述抗战必胜的道理,警告他们绝不要当汉奸,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还劝告群众不种大烟,抵制日寇毒化政策。

我被分配到宣传组当宣传员,经常到各村庄集镇、田间地头进行宣传活动。每到一处就刷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演出自编自排的文艺节目,如快板、话报剧等。等群众聚集起来之后,就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流亡三部曲》和《国共合作歌》等抗日歌曲,然后由宣传员发表即席演讲,揭露日本鬼子的暴行,讲述我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事迹。宣传组所到之处,歌声嘹亮,气氛热烈,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和信心。一次到王邵村宣传,我和一位姓王的大娘自由交谈,先讲了些抗日道理,又问她家里生活怎么样。她说:“别提了,鬼子兵过来叫人没法活。你们讲的对,非把鬼子赶走不行。”接着她问我是哪里人,当我告诉她我是流寺人我叫什么名字时,她哈哈大笑:“原来咱是一方人啊!”没想到在七、八年之后,我在八区当区长时她到白龙庙找到我,在回忆了往事之后,要求让她的小儿子参军。我看这个孩子年龄尚小,婉言劝阻,但她执意坚持,我只好收她儿子当了区民兵队的战士。

1939年初,国民党调整政策,从重点对外改为重点对内,出笼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张韶华由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筱尚领导的政工团极为不满,视若肉中刺。他骂政工团同志是“八路迷”、“八路痞”。说:“你们被赤化了,吃着我的饭,替共产党干活。”于是派他弟弟张从周和几个三青团骨干分子加入政工团,想法从内部进行控制,但收效甚微。又想通过我父亲劝说我哥哥按他的旨意办事,遭到筱尚拒绝。张韶华恼羞成怒,

1939年2月悍然宣布：“政工团查无编制，立即解散。”

一个生机勃勃的抗日团体就这样在张韶华的蛮横阻挠下被迫停止了活动。

上抗大去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筱尚立即派侯金镛到林县向何高民汇报。何高民说这里不让抗日，就到能抗日的地方去。抗大一分校已来到山西屯留，除筱尚在地方设法坚持继续活动外，欢迎政工团的同志到抗大去。政工团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高兴，好多人要求去抗大学习。这时张韶华又出来百般阻拦。他在大会上说：“跟共产党走，上抗大，没有前途。”还找一些青年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去西安、洛阳参加国民党办的训练班，同时许诺谁去给谁二十块钢洋做路费，去抗大一分钱没有。他还指使人暗中拉拢侯金镛，劝他不要动员人上抗大，只要好好跟着县长干，保准给他个区长干干。侯金镛不为此所动，坚持要走抗日道路。经过短短几天酝酿，就有二十多人报名去抗大学习，而表示去洛阳、西安的只有崇义的张友绍、张友良少数几个人。批准第一批上抗大的有我、宋子美、范忱挺（范厚钟）、孙宝英和杨秀珍五人。我父亲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当众对我说：“年轻人就得出去闯闯世面，只要爱国抗日到哪里都行。”我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坚决抗日到底。

1939年2月底的一天，我们首批五人整装出发。政工团全体成员列队相送。我们共同高唱：“别了，别了，同志们再见，再见在前线！”我们身背背包，肩挎挂包，在侯金镛同志带领下踏上征途。第一站是林县的白草坡，在那里，小学时的老师何高民热情接待了我们。他讲了国内外形势，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祝我们前途顺利。他写信介绍我们到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办了内部介绍信。侯金镛到此完成护送任务，我们随即西行经山西壶关县到达陵川县平

城镇战地报社总部(即八路军工作团),接待我们的是曾去政工团工作过的老熟人、社长魏十篇。他提出一个建议:“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就在华干学习吧。”华干即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就在平城,名义上是河北民军办的,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但我们对抗大向往已久,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办了手续继续上路前行。

长途跋涉在崎岖的山道上,对我们从未出过远门的小青年来说,实感困难。但大家互相鼓励,情绪昂扬,一路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曲,坚持前进不掉队。当在阳城住下休息时,都累得不得了,但没一个人说累。还是带队的大哥哥宋子美直接了当地说:“啥事都要实事求是,明天雇个毛驴驮背包,咱步行前进。”这一下说到大家心坎里,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就雇上毛驴赶路。我们边走边跟赶毛驴的老乡聊天,他说:“闫老西那边当官的走路都骑骡子,你们八路军不一样,官兵都是步行。”这使我们感到老百姓辨别事物的眼光好坏分明的。这天下午到达山西长治,到县政府找县长办理手续。一进县长办公室,见室内鸟语花香,摆设阔气,就觉得不对劲。一会儿,县长聂士庆来了,没等我们说完来由,就给了个闭门羹:“我们不管此事。”我们莫名其妙地退了出来,拐弯碰到一位职员,他关心地问有什么事,我们说要办上抗大的手续。他说:“你们找错门了,到西大街路北大庙里找八路军办事处。”顿时我们恍然大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办妥了手续。事后得知,那个姓聂的是闫锡山派来的县长,日军占领长治后他摇身一变当了汉奸县长。

从长治出发又走了一天,就到了屯留县故现村抗大一分校校部。这次行程跨越两省、途经八县、长达数百华里。沿途看到抗日根据地广大群众热情高涨。到处歌声嘹亮,红旗飘扬,极大地振奋了我们的革命精神。途中遇到的不同情况,使我们产生不同的感想: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真是泾渭分明!

经组织研究,我和宋子美、范忱挺被分配到第三支队第三十九

中队，孙宝英、杨秀珍被分配到校部直属女中队。我们来到岗上村中队部时，受到老红军刘中队长、王指导员和三分队王队长以及先期到达的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领导把我分到八班，同学们倒水端脸盆为我洗尘，把我长途跋涉的疲劳消除得干干净净。

1939年3月上旬，抗大一分校第五期正式开课，进入紧张的学习阶段。学校在课程安排上的原则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方面主要讲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近代革命史》等。在军事方面重点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经验。在武器装备上，每班一至二支钢枪，由正副班长持用，其余同学每人一支梭标、三颗手榴弹。学习方法生动活泼，不死啃书本，不背教条。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战争实际相结合、与社会活动相结合、与军事演习相结合，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基础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取得很大的收获。我的主要收获是：一、初步明确和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记得开始弄懂社会发展规律时兴奋不已，当即给父亲和哥哥写了一信，告诉他们我心中的喜悦：“我明白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来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我们现在的奋斗终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我简直就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鸡一样，发现世界是那样的广阔，前途是那样的光明……”二、初步理解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军事理论，明白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主要战术是游击战，从而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为我后来在部队作战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战经验的借鉴。至今对毛主席制定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记忆犹新。三、在艰苦的学习、战斗实践中，初步树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信念。总之，通过抗大学习锻炼，使我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抱负，是

我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是年7月1日,十八集团军总部在驻地总村举行党政军地万人群众大会,纪念党的生日。

我抗大全体师生荣幸地参加了大会,首次见到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高级领导干部,聆听了他们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特别是彭副总司令重点讲述了当时延安和西安——国共两党、两大阵营的政治形势,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觉悟,鼓舞了斗志。

同年7月7日,抗大原本准备举行纪念抗战二周年的隆重纪念活动,但由于日军进攻晋东南上党地区,校部不得不取消纪念活动,进行积极主动的战略大转移。全校从屯留县出发,途经潞城、平顺到达壶关县,校部进驻神郊村,我中队驻于大会村。这次战略大转移使学员们受到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按校部部署,转移途中边行军、边学习、边讨论,紧张而有秩序。傍晚宿营后还要上山打柴、背粮、采豆秸和树叶当菜吃,夜间轮流站岗放哨警戒敌人。脚上打了泡,第二天照样行军,甚至是急行军。面对艰难困苦,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步步走向目的地。当时,我在班中年龄最小、体力最差、困难最多,班长铁瑛同志(河南南乐县人,后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不仅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我。学习时具体指导,讨论时引导重点,行军中时而帮我扛标枪,时而帮我背背包,休息时促膝谈心,夜间我站岗放哨时,他带班给我壮胆……。八月间,我们三分队远离中队到陵川县牛恋岭村担任前哨阵地警戒。当时日军正在进攻陵川,炮声隆隆,战斗极为激烈。一天夜晚十二点钟,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站在山坡要道口上放哨,身上发烧得了感冒。心里也有点心惊胆战。于是,我竭力镇定情绪,一手紧握标枪,一手拿手榴弹,面向前方敌人阵地,心中默念着“艰苦奋斗,打击敌人,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战斗口号,就这样,精神振奋了,病